

# 父亲今年一百岁

□尚东明

再过几天,便是老父亲100岁生日了。

农历二月二刚过,家里的亲朋好友便络绎不绝,不少人是为了一睹百岁老人的风采。然而不管人多,老父亲总是安然平和,依旧每天9时起床,22时睡觉,每晚必喝一碗红薯稀饭。逢天晴日暖,他便骑着三轮车到清溪河游园,与老友们说会儿话、听会儿戏,然后骑三轮车回家。他不要人跟,也不要人扶,否则会生气。天阴下雨出不了门,便在屋里甩甩胳膊踢踢腿,有时还打几趟拳。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全家人期盼着老父亲的百岁生日,唯独他不以为然,总问山东那边有消息吗?果然,我接到了山东省台儿庄抗战纪念馆打来的电话,说如果没有疫情,条件允许的话会派人送寿匾和花篮,并通过微信发来贺信;祝贺台儿庄抗战河南唯一健在老兵尚书来老先生百年华诞。祝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父亲是识字的,看完贺信,眼眶一下子湿润起来。他说:“台儿庄抗战全国参战部队29万人,我们20集团军8万人,河南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开始断断续续讲起了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我的父亲叫尚书来,1922年3月18日(农历二月二十)出生,祖籍山东省泗水县。爷爷弟兄七人,因闹匪患领着七岁的父亲来到许昌。家里穷,父亲十四五岁便当了车行当起了学徒。他喜欢汽车,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当时汽车轮胎充气用人工打气筒,打一次气双手磨出很多水泡。父亲聪明好学,师傅很喜欢

他,他的技术也比其他师兄略高一筹。这天父亲正在家休息,师傅开车到家叫他,说是参加了部队,开车去山东打鬼子,只让带一个徒弟,问他去不去。父亲二话没说,只给爹娘道了声“我跟着师傅去山东打‘老日’去了”,便登车而去。那天,距他16岁生日还差10天。

3月初的天气乍暖还寒,父亲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向东。虽是热血救国,当时真不知道这是哪支部队,要去哪里打仗。后来才知道他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0集团军第110师,师长叫张轸(后于湖北起义,解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长)。这是一支杂牌军改编的部队,说是一个师,其实就两辆车,一辆小车师长坐,另一辆是父亲和师傅开的货车。

3月16日部队抵达台儿庄外围,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开战第二天,在硝烟战火中,父亲度过了他的16岁生日。

110师担任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15公里的防务。刚开始,师徒俩开车运送弹药和物资;随着战事的扩大,双方激烈争夺,日寇出动飞机坦克,部队伤亡惨重,父亲的任务改为战地救护和运送伤员。

3月下旬,台儿庄战役进入胶着状态,师长张轸命令全师每人统一佩戴有“翼”字的臂章,据说“翼”字取自师长的字“翼三”。后来人们称110师为“翼字军”。白天,师长命令两个炮兵营向韩庄轰击,给日军造成很大威胁;夜晚,师长率大刀队偷袭日军营房,杀哨兵,炸军火库,闹得日军胆战心惊。“翼字军”经《申报》报道,威名传遍全国。3月29日,日军主力向台儿庄发起总攻,台儿庄大部失陷。此时,日军后方空虚,张轸命令全师出击峰县,断敌人后

路,完成了20集团军对敌的包抄。

台儿庄战役双方共投入30多万兵力,场面异常惨烈。父亲说到这里又掉下了眼泪。他说战争太残酷了,连运河水都染红了,四处是枪炮声,遍地是尸体。110师装备简陋,伤亡更加严重。刚开始白天抢运伤员,每每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后来改为夜间运送。汽车每趟拉30多名伤员,不敢开车灯,摸黑行进,否则不是飞机炸就是野炮轰。“前线在延伸,我们也在前进。从前线到火车站,在一分钟不耽误的情况下每天晚上能运6趟。有一天,夜里拉着伤员刚出了小树林,敌人飞机就投下了照明弹,炸弹随即而至,我开着汽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总算躲过敌机的轰炸。有好几次汽车被日军的野炮跟踪,幸亏左躲右闪,险些一人命丧枪下。”父亲回忆说。

4月6日,台儿庄战役进入反攻阶段,父亲白天晚上加班运送伤员。“从3月16日战役开始到4月15日结束,父亲掐指算着,“30天内我和师傅共抢救6000多名伤员。”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当年5月底,徐州会战失利,父亲随110师撤到了南阳山区,后来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南阳保卫战、唐河保卫战等大小几十场战斗,最后退守豫陕边界山区,固守大西南首道防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从16岁离家到抗战胜利,父亲和他们那代人一样,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和生死离别的煎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许昌,在父母身边娶妻生子,耕地种田,一家人其乐融融。

1949年年底,许昌成立了许南汽车运输总站,父亲挎个拾粪篮拾粪送到了司机招考现场。当时司机

很缺,考生一个个不合格,急得考官直跺脚。父亲放下拾粪篮说“让我试试”,结果一次成功,留下姓名、地址,又挎着粪篮拾粪去了。过了年,家里人非要父亲去上班,爷爷、奶奶不愿意,来人可不干了,说新中国建设缺人才,不能让这么好的司机再去拾粪呀。从那以后,父亲成了一名新中国的工人。

父亲的驾驶技术是在战场上练就的,上班几个月便被选调到了许昌客运汽车站。当时汽车少,路况差,每天五六时发车,20时后才能收车。路上没饭店,一年下来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病,天天打嗝不止。1951年抗美援朝需要年轻司机,父亲第一个报名,后因胃病没被选中,至今深感遗憾。

父亲爱车如命,在许昌客运汽车站兢兢业业一千九十年,他的车上曾挂过“百万公里安全无事故标兵车”“全省节油标兵车”等奖牌。我小时候记得,我们家的墙上贴的都是爸爸的奖状。妈妈总是骄傲地指着墙上的奖状说:“你们长大了也应该像你爸爸这样当标兵、当模范。”

“文革”初期,父亲被误解,说是当过国民党兵,大姐入团政审没过,父亲也被下放到许昌汽车站开货车。父亲说,有车开,到哪儿带兵的首长汇报了父亲的情况,首长派专人到许昌客运汽车站和许昌汽车站政审,结果是“历史清白,表现进步,同意入伍”。那年我抹去了心中的阴影穿上了绿军装,姐姐也入了团。

父亲是一级司机,在全县技术最好,开的车却最破。1974年,我从部队回来探亲,过年都不见父亲回家,于是到许昌探望他。没时间叙旧,我便坐上他拉货的车在途中边

走边说。说着说着,只听咔嚓咔嚓了几下,汽车停了下来,父亲说没动力了。下车一看,传动轴掉在了后面100多米的路上。我捧腹大笑,父亲瞪了我一眼说:“走,抬回来。”抬回传动轴,一看是螺丝断了,恰逢父亲同事的汽车路过,给汽车站捎了口信。一个多小时后,站长带着修理工来了,一看还有个解放军战士帮忙,十分感谢。父亲说:“那是我儿子。”站长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父亲开的车最破,完成任务是最好的。”

1976年,父亲从许昌调到许昌烟草车队。当时车队一色日本三菱汽车,父亲说,咱中国啥时候能造这么好的汽车呢?他在烟草车队是特级司机,任劳任怨,被评为全省供销社系统劳动模范。领导交代他多培养年轻人,十几年间他为车队带出了十几位徒弟,就连我兄弟的岳父也是他的高徒之一。

父亲开车开到63岁才光荣退休。退休后他总想干点啥,看到附近有人自行车坏了没地方修,就在家里的窗下摆了一个义务修车点,守着一把气筒、一杯茶,几声谢谢听一天。父亲有时喝两杯小酒,也时常向路人夸耀,老尚此生干好了三件事,一是打好了“老日”,二是开好了汽车,三是教育好了六个子女。是的,在父亲勇敢、勤奋、善良、节俭品德的哺育下,我们兄妹六人五个大学毕业,个个都成长为有用之才。

百年沧桑岁月,百年风雨家国。转眼间,父亲100岁了,他是经山东省台儿庄抗战纪念馆在全国调查后认定的血战台儿庄河南唯一健在的老兵。他说:“我真想再去看台儿庄,问问我29万大军中还有几人健在,想和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



总第一四二〇期

春秋楼

## 她们的力量

□祁柯柯

“女性的眼睛,既可以温柔地注视痛苦,也可以锐利地俯瞰繁华;女性的双手,既可以烹饪出流转的美味,也可以指挥行进中的航船;女性可以在艺术中浸润出一份修养,也可以在科学中历练出一种风度;既宜室宜家,也为国为民。”这是《朗读者》中对女性的一段描述,是对女性美丽的赞扬,更是对她们力量的肯定。柔弱常常是她们的代名词,但我眼中的她们,不仅有力量,还撑起了半边天。

她们的力量,是无私无我、哺育生命。春节时我去探望一位刚生下宝宝的小学同学,才知道她爱人在部队服役已十年有余,两人聚少离多,从结婚到生子,都是她一人撑起这个小家庭。我看着她把头发简单束起,利索地穿着休闲平底鞋,在宝宝的哭声笑声喊叫声中游刃自如,不禁好奇:“你不累吗?”可能是那天天气有点暖,她随手抹了下额头亮晶晶的汗,咯咯地笑起来,下巴微微一昂:“人家不是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嘛。我累的时候看看宝宝,想想他,就又能量满满了。”世上如果有比“温柔”更温柔的词,那一定是母亲;世上如果有比“力量”更有力量力的词,那一定是母亲。因黎洛夫说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是的,作为母亲的她们,拥有着永远不会枯竭的力量。

她们的力量,是坚定支持、默默守护。前几天青工委组织观看红色教育片《焦裕禄在洛矿》,在又一次被焦裕禄精神感动的同时,我更被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深深触动。当她满心欢喜地和他盘算着一大家子终于可以搬进新房子时,丈夫却告诉她,为了留住厂里的技术骨干,自己打算把组织分给他们的房子让出去。她拿着针线的手捏紧了又松开,眼神闪了几下,又极快地对他点了点头:“你啊,心里永远装的是集体……”然后利索地盘算起怎么在小屋里再添两张床……从古至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好男儿,或奋战沙场,或投身边疆,或奉献一方,他们往往被称作英雄,但若忽略了背后的她们,那这英雄二字就无法书写完整。

她们的力量,是勇担重任、扛起一片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曾对抗击疫情的女同志们这样评价:“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中国女性,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以勇气和辛劳诠释了医者仁心,用担当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禹州市纪委监委有70余名女同志,她们不是医者,可在禹州抗疫之战中,风雪中的督导一线有她们,节奏胜似战场的专班组有她们,无数个灯火不灭的指挥部办公室有她们,负责核实需转运人员信息的欢欣恨不得一次接三部电话,一天下来嗓子哑哑也顾不上喝口水;李丽在采样组20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抽空眯上半个多小时,又神采奕奕地投入战斗;刘璐每天穿梭在疫情防控的各个战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在学生转运现场,她冒雪彻夜坚守。看着孩子们拖着行李踏上前往隔离点的车辆,她心疼得直掉眼泪。每一次见到她,总能看到她脸上藏不住的憔悴,却又带着一份坚定。这就是她们,带着坚毅笃定的信念,所到之处,都播洒下战无不胜的信心。

若有大梦筑胸襟,巾帼何曾让须眉。她们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这个世界的力量有多大,她们的力量就有多大。

## 老街

□闫博琳

老旧的石砖路,斑驳的灰瓦墙,充满岁月的痕迹。流连其间,最能触动人心的是那熙来攘往的繁华与热闹,是那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是我对这条老街的初印象。

记得五岁时,爷爷带我这儿见他的一位老朋友,我第一次见到这条老街,便被深深吸引。此后,我便跟着爷爷常来这里,观看戏台上的演出,品尝特色的美食,感受质朴的温情。那大红的灯笼、逼真的糖人、喷香的烤红薯、晶莹的糖葫芦……每次都让我流连忘返。可惜的是,我八岁时全家搬迁到了外地,便再也没有机会来看一看这条老街了。直到六七年后,才有机会再去看一看。

那天,哥哥带我去参加他同学的婚礼。婚礼进行了大半,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偷偷溜了出去,来到这条老街。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道上空无一人,戏台哪里去了?美食哪里去了?热闹的人群、繁忙的店铺都到哪里去

了?我在心中迷惑,回应我的只有萧瑟的秋风。我不甘心,努力寻求着,终是在街角找到了几户人家。我又见到了爷爷的朋友,他告诉我,随着新城区的建设,人们都跑去商业中心了,连那些老店铺的老板也都在那里开了新店。听完他的话,我陷入了沉默。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笑着说,这条老街要拆迁了,新的商业中心会更加便利、舒适,那些商铺赚的钱比这里要多得多,你应该高兴啊。老街的衰落,是另一处更繁华的诞生。

听完他的话,我释然了。与其怀念过去,不如一切向前看,珍视现在。沉溺于过去的人,会忽视生活中的美好,更容易陷入悲伤的沼泽;珍视现在的人,有一双发现美好的慧眼,终会成为生活的强者。看看周围的一切吧,有悠悠白云,有明媚阳光,有你爱的人,更有爱你的人。明媚阳光更能透过心房,带来幸福与希望。

我又看了一眼老街,将它印在我的心里。微笑着,我走出老街,带着成长,更带着希望!



水乡春韵 吕超峰摄

## 老家的校舍

□刘宗熙

大仝小学位于坞山镇大潭沟和全庄两个村的交界处,是一所集小学和附属幼儿园为一体的山村完全小学。去年教师节,我和几位朋友来到大仝小学,代表教育基金会慰问教职工。时令还是初秋,我却感到深深的凉意。

在学校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全庄、大潭沟两个村的支部书记、全体教职工和我们,校长几度哽咽。这些年来,老师们苦心经营,还是没能挡住生源的减少,现在全校只有17名在校生了。看着会议室里省、市、镇各级部门颁发的一张奖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知说什么好了,于是决定请全校老师吃个饭,这样的聚会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了。去饭店的路上,几处老校舍依次映入眼帘——几十年来,老家的学校几经搬迁,逐渐兴旺,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大潭沟村头有一栋建于清末的两层青砖小楼,据父亲讲,那是解放后周围四个村最早的学校。楼是村里郭姓富农家的,第一学期只有十几个学生,两位教师,校舍很宽松。没想到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天,来报名上学的学生就挤满了学校。乡里

的领导当即决定把学校搬到全庄村一个地主家的四合院里。后来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四合院周围几户中农的房子也被扩充给了学校。尽管如此,校舍还是紧张,一位姓侯的老师为了给学校省地方,甚至把附近的小庙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

人民公社成立后,我们大潭沟大队有了自己的学校。等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已有百十名学生。除了教室,还有一个简易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两根木杆、一块板做成的篮球架和用砖头垒成的乒乓球台。教室由三间瓦房和几孔窑洞组成,窑洞里光线很暗,到了阴雨天,上课就要点上煤油灯。瓦房的窗户很小,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实在热得受不了了,老师就把我们班带到了校外的小树林里上课,黑板就挂在树上。

1975年,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要求大队也要有初中,大潭沟小学响应号召办起了初中班。初中班的教室是大队林场的两孔石头窑

洞,可是师资力量不足,只好按照“小学戴帽”的说法,让小学老师来教初中。其实老师够不上够影响不大,那时学生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很少,因为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要学农、学工、学军,当时叫“开门办学”。不识字的农民被请到学校门口传授农业种植方面的经验,学生要到地里干活。村里没有工厂,就到铁匠铺或木匠家里学些简单的技术。学军是请了几位复员军人,教学生立正、稍息、卧倒和匍匐前进等军事动作,还教些耍大刀长矛之类的基本功。有位姓刘的复员军人更是领着学生在山上挖过战壕。这么热闹了一年,初中班就停了,想继续上初中的就只能转到全庄中学。

我在全庄中学上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勤工俭学。班主任领着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然后免除我们的学杂费。那位曾经在庙里办公的侯老师带着我们赤脚踩泥,打制砖坯,然后把晒干的砖坯送到砖窑,请烧砖的师傅烧成青砖。全庄中学

的好几个教室都是用我们师生做的“小学戴帽”的说法,让小学老师来教初中。因为学会了这个手艺,我家建第一所新房时,我就领着几个弟弟做砖坯烧砖。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入人心的一个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农村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以捐资建校助学为荣。那时我在磨街镇政府工作,分管教育,教师出身的我对建校助学更是投入了很多个人感情。记得一次酒席上,有个煤老板说,如果我喝一大杯酒他就多捐1万元建校款,结果我喝得酩酊大醉。一年以后,磨街乡各村校舍焕然一新,此事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个人也被禹州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趁这股东风,我们村的小学由那几孔土窑搬到了新建的几栋小楼里。

又过了十几年,坞山镇政府决定把大潭沟村和全庄村的两所学校合并为大仝小学,这时我已经离开